

# 媒介化协商共治： 一种成长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路径

牛耀红

**内容提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最新探索成果。论文从基层协商民主视角研究了数字媒介如何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发现，数字媒介赋权公众，促使公众以媒介协商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弥补基层治理主体“协商不对等”的潜力，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合作治理格局，即“媒介化协商共治”。这种民主实践中，数字媒介建构了社区公共领域，整合多元主体，强化公共交流，建构社区共识，推动集体行动，从而有利于实现基层“善治”。这种治理模式中“媒介逻辑”介入“政治逻辑”，创造了一种“全时段”、“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参与途径，数字媒介以其“可供性”和“可见性”逻辑促进了主体扩大化、参与直接性、过程透明化、民主真实性。因此，媒介化协商共治是一种典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式，对于增加社会主义民主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协商民主 公共传播 媒介化研究 过程—事件分析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民主是众多有识之士及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价值追求。从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到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德先生”，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民主都是反对和瓦解封建专制及改革进取的重要武器。中国共产党更是重视民主，从苏维埃时期的工农民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民主，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基层民主，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而且，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探索适合中国的民主模式，“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其最新成果<sup>①</sup>。

全过程人民民主由“全过程民主”理念发展而来。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在视察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时，首次提出了“全过程民主”理念。习近平强调：“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sup>②</sup>由此可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对“中国式民主”的进一步探索。

<sup>①</sup> 吴玲娜、赵欢春：《全过程人民民主：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必然》，《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sup>②</sup> 唐亚林：《“全过程民主”：运作形态与实现机制》，《江淮论坛》2021年第1期。

## 一、研究问题

虽然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近年来提出的重大理念，但学界已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了清晰认知，研究了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断的理论创新<sup>①</sup>、固有本质<sup>②</sup>、历史基础<sup>③</sup>、结构要素<sup>④</sup>、实践特征<sup>⑤</sup>以及价值追求<sup>⑥</sup>等基础问题。这些研究很好地回答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观念问题。不过，民主不仅是观念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民主实现必须将其转化成制度、信仰、习惯乃至生活方式，这就需要促使民主从理想走向现实、从原则走向制度、从规划走向程序。学界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路径也展开了探讨，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sup>⑦</sup>、人民政协<sup>⑧</sup>、政府参事制度<sup>⑨</sup>、基层协商治理<sup>⑩</sup>等路径。从上可知协商民主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了协商民主在人民民主制度化方面的重要地位。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本文将从基层协商民主视角探讨如何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基层协商民主。其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这种民主发生在中国，同西方协商民主具有不同特性；二是这种民主形式贴近基层人民生活，与国家层级协商民主有所区别<sup>⑪</sup>。近年来，我国基层形成了多种民主实践形式，比如浙江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河北馆陶县的“星期一夜谈会”、安徽桐城市的“村民组例会”等。不过依然存在群众被迫式协商、流程固化式协商、形式主义协商等问题<sup>⑫</sup>。其中，基层协商主体权力不对等是根本问题。

协商民主是关于集体的政治意愿——应当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是一个寻求

① 江国华、方歆然：《习近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断的理论创新》，《社会学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② 林毅：《重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探索》2022 年第 2 期。

③ 汪仕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知识脉络与历史经纬》，《天津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 期。

④ 赵谦、张晓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结构要素论》，《河南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 期。

⑤ 廖璐婷：《全过程人民民主参与实践的特征》，《学术探索》2022 年第 12 期。

⑥ 孔庚：《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内涵、价值追求与实践遵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 年第 11 期。

⑦ 程恩富、孙绍勇：《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超越——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 年第 10 期。

⑧ 周淑真：《人民政协：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制度载体——历史逻辑、方位体现与职能机制考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 年第 2 期。

⑨ 焦洪昌、杜浩鹏：《政府参事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侧面》，《行政管理改革》2021 年第 12 期。

⑩ 贾双跃：《迈向“新集体行动的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政治学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⑪ 赵秀玲：《中国式基层协商民主的成功经验与未来发展》，《甘肃社会科学》2022 年第 3 期。

⑫ 赵秀玲：《中国式基层协商民主的成功经验与未来发展》，《甘肃社会科学》2022 年第 3 期。

信息充分、自由沟通、科学协商的集体同意过程<sup>①</sup>。不过在当前多元社会背景中，公众通过交流协商，形成共识是一个困难、漫长而又不对等的过程<sup>②</sup>。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将这种状态称作“协商不对等”，主要包括权力不对等、交流不平等以及公共能力缺乏三种类型<sup>③</sup>，具体指公众或团体不能有效进行政治参与，导致民主协商过程不透明、协商结果不充分，甚至协商无法达成。对此，詹姆斯·S. 费什金（James S. Fishkin）指出，必须具备政治平等、审慎协商、扩大参与这些要素<sup>④</sup>，才能实现充分协商、扩大共识，最终实现国家善治。

本文认为“数字媒介技术”是促进以上条件达成的可供利用的要素。毫无疑问，数字媒介已经对人类民主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互联网兴起之时，德国明斯特大学学者维夏德·沃伊克（Wishad Wojak）曾指出：“因特网迅速发展向政治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因特网的巨大潜力是否会使民主更具活力？”<sup>⑤</sup>然而关于互联网对民主的影响却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美国政治学家奇尔科特（Ronald H. Chilcote）认为：“经典精英民主理论核心前提是在每个社会里少数人做出主要决策，这在网络时代也没有根本性变化。”<sup>⑥</sup>而且部分学者还认为新技术会使少数人更加轻松控制群众情绪，从而使权力更加集中<sup>⑦</sup>。乐观派则认为，新技术促进和捍卫了民主与言论自由。1996年，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出：“利用先进的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话、有线电视、投票技术及其他工作，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作出自己的许多政治决定。”<sup>⑧</sup>约翰·基恩（John Keane）则以传播技术划分民主形式。他认为印刷媒体是代议制民主的基础，而在新信息革命和媒体技术支撑下，应该生成一种公众更加广泛参与的“监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sup>⑨</sup>。

不过，以上论述常放置在西方民主实践中。新媒介与中国式民主会产生怎样的际遇还需要深入探讨。我国学界对于新媒介与民主关系的论述同样有乐观和悲观两种取向。于淑婧和荆学民认为，“自媒体时代”井喷式政治表达并未带来公民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沟通，反而使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面临种种沟通困境<sup>⑩</sup>。乐观

① 赵立兵、申启武：《从“宣传”到“对话”：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传播进路》，《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3期。  
 ② 赵立兵、申启武：《从“宣传”到“对话”：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传播进路》，《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3期。  
 ③ [美] 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④ [美] 詹姆斯·S. 费什金：《倾听民意：协商民主与公众咨询》，孙涛、何建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7页。  
 ⑤ 郑曙村：《互联网给民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2期。  
 ⑥ [美] 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高钰、潘世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3页。  
 ⑦ [美] 西奥多·罗扎斯克：《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苗华健、陈体仁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第195页。  
 ⑧ [美]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焘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476-477页。  
 ⑨ Keane J., *Democracy and Media Deca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77-108.  
 ⑩ 于淑婧、荆学民：《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与协商民主的衔接进路》，《浙江学刊》2022年第3期。

派则认为新媒介技术可以促进民主，赵爱霞和王岩指出，在新媒介赋权常态化、人工智能大众化的智媒时代，数字协商民主成为调和政府与社会、专家与民众、技术与民主关系的有效路径<sup>①</sup>。总体而言，多数学者认为媒介技术赋予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得公众具备了成为民主真正主体的潜力。当前，学者围绕媒介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展开了相关研究，高洪贵和张换认为，媒体融合以其全息视角、全程追踪、全效传播的优势，为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环节有机衔接提供了强大动能<sup>②</sup>。陈静文和张健认为数字技术可以有效助力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主体参与扩大、社会合力增强、权力监督增效<sup>③</sup>。高奇琦认为智能媒介技术可以使公众进行低成本政治参与，提高合作决策质量以及开展广泛监督，从而有利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施<sup>④</sup>。不过，这些探索以思辨研究为主，缺乏实证研究。这就导致全过程人民民主只见整体，不见个体；只见结果，不见过程。其实，民主理念和实践存在巨大鸿沟，假如数字媒介确实具有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潜能，那么公众如何成为协商主体？如何基于数字媒介展开协商？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可能会遇到哪些障碍？这些问题只有在民主实践中展开研究才能解决。

因此，无论是发端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还是生发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都在如何有效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大力增进社会沟通对话，乃至重塑“国家－社会”关系，存在理论创新和探索改进的巨大空间。这就为运用现代媒介技术、改进政治宣传理念、提升政治传播能力创设了必要条件<sup>⑤</sup>。调研发现，一种基于数字社区公共媒介的协商治理实践具有解决“协商不对等”问题的潜质，这类媒介赋权公众，促使公众成为治理主体，增强了公众的政治参与度，有利于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因此，本文将研究数字社区公共媒介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和机制。

## 二、研究思路

### （一）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案例遵循“典型性”原则，这一原则不追求个案结论推断总体，而是通过对特殊典型案例的深入研究丰富既有理论要素并拓展理论边界<sup>⑥</sup>。按此原则，本文选取治理绩效优异的“为村”平台作为研究对象。以陶坝村案例为支撑的“邛崃为村”于2020年入选全国第二批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因此本文以陶坝村“为村”实

① 赵爱霞、王岩：《新媒介赋权与数字协商民主实践》，《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② 高洪贵、张换：《媒体融合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向度、限度与路径》，《理论探讨》2022年第6期。

③ 陈静文、张健：《论数字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作用、挑战与对策》，《湖湘论坛》2022年第6期。

④ 高奇琦：《数字技术如何支持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落实》，《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6期。

⑤ 赵立兵、申启武：《从“宣传”到“对话”：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传播进路》，《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3期。

⑥ 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践为研究对象。

陶坝村地处四川省邛崃市。据史书和家谱记载，这里的陶姓村民是诗人陶渊明后裔。因此，陶坝村对外宣称“陶氏故里，诗画田园”。陶坝村在治理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困境：一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庄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二是村两委公共服务效能低下，外出村民无法及时获取公开信息，干群矛盾严重；三是村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基层民主协商机制没有建立，各类群体无法形成合力。

上述问题是中国很多农村面临的共性问题。对此，四川省邛崃市于2017年在189个村（社区）开通了“为村”平台，希望实现数字化治理。“为村”平台是依托微信开发的智慧乡村平台，围绕“党务、村务、商务、服务、事务”设计了“党务公开”、“村务公开”、“议事厅”、“书记信箱”、“村友圈”等板块。截至2022年12月，全国共有30个省（市、区）开通了17410个“为村”平台。

## （二）分析框架

本文以“媒介化理论”为分析框架进行研究。近十年，欧洲学界开启了从“媒介研究”向“媒介化研究”的范式转向<sup>①</sup>。媒介化研究的核心要义是媒介不再只是发挥“中介”作用，而是媒介逻辑成为了深入影响社会的重要因素。媒介化研究有两种传统：一是以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为代表的“制度化传统”（institutional tradition），这种路径以“结构”为出发点，强调媒介逻辑具有重塑其他社会机制的潜力，能够使之转向“媒介化”运作方式；二是以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安德列亚斯·赫普（Andreas Hepp）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传统”（socio-constructivist tradition），这种路径关注特定媒介作用于个体现实的互动过程，以及这种媒介如何建构新的“社会现实”。总体而言，制度化传统以“宏观/中观”视角理解媒介与社会间关系，媒介被理解为一种拥有自身运行规则的社会机构；社会建构传统则从“微观视角”强调个体能动性对于媒介技术特性发挥的作用<sup>②</sup>。这两种研究传统各执一端都有失偏颇，实际上媒介化是结构化和个体能动性互动的过程。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需要建立一套中观路径，即考察哪一种新“社会形式”由媒介化的传播过程而生成，他将这种介于个体与社会间的“社会形式”称为“型构”（figuration）。因此，媒介化研究就转换成了探究“型构”形成的过程。安德烈亚斯·赫普认为传播型构包含三个基本特质：“行动者丛”（constellations of actors）、“指引框架”（frames of relevance）、“交往实践”（communicative practice）<sup>③</sup>。“行动者丛”是型构的结构基础，具体指型构中开展社会行动的各类行动者。“指引框架”是各行动者在型构中行动的“指导原则”，即行动“主题”。“交往实践”是指

① 戴宇辰：《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② 戴宇辰：《媒介化研究的“中间道路”：物质性路径与传播型构》，《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③ Hepp, A., Breiter, A., & Hasebrink, U.,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ransforming Communications in Times of Deep Mediatiz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30.

行动者在型构中的社会互动。本文将以此为框架研究媒介化治理“型构”形成过程。

###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法进行研究。这是我国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提出的一种研究策略。他在从事土地改革五十年以来农民生活经历的口述史研究时指出“‘过程－事件分析’强调带有事件的过程，特别是有开头、有结尾、有情节的事件过程”<sup>①</sup>。2000年，孙立平在《清华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农村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的一组文章，首次正式展示了“过程－事件分析”<sup>②</sup>。从方法论角度讲，“过程－事件分析”是对传统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路径批判基础之上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力图将研究对象由静态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构成的动态过程，并将过程看作一种独立解释变项或者解释源泉<sup>③</sup>，是一种旨在识别动态因果机制的方法，通过考察因果的中间过程反观因果关系的可能性<sup>④</sup>。对此，研究者采用田野调查和线上民族志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分别于2019年7月、2020年6月、2021年10月，三次共26天进入陶坝村开展田野调查，对村两委成员、“为村”管理员、“为村”核心人员以及部分村民共50多人进行了访谈，并参与了部分线下公共活动。研究团队收集了陶坝村“为村”平台2017年至2022年的资料，按照时间线索和事件线索分别归类、整理、分析，以清晰呈现陶坝村的媒介化治理过程。

### 三、基于数字社区公共媒介的协商治理实践路径

按照媒介化“型构”形成逻辑，基于媒介的治理融合了“媒介逻辑”和“个体能动性”的沟通、协商、合作过程。本文对“媒介逻辑”的探究将引入“媒介可供性”理论。“可供性”由生态心理学者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提出，是指“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性”<sup>⑤</sup>，比如，动物对环境线索及其有用性产生感知，做出行动上的反应或调整，又会反过来影响环境<sup>⑥</sup>。这个概念在哲学、心理学及自然科学等学科被广泛使用，如今“可供性”更多被用于探讨技术为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行动者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亦可称之为“技术可供性”<sup>⑦</sup>。传播学者也将可供性理论应用在媒介研究中。2017年，潘忠党教授提出了媒介可供性，并将其

① 淡卫军：《“过程－事件分析”之缘起、现状以及前景》，《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年第6期。

② 淡卫军：《“过程－事件分析”之缘起、现状以及前景》，《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年第6期。

③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④ Gerring I., “The Mechanismic Worldview: Thinking Inside the Box,”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no. 4, 2008, pp. 161–179.

⑤ Gibson, J. J.,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86.

⑥ 王海燕、范吉琛：《数字新闻的时间可供性：一个研究框架的提出》，《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9期。

⑦ Juris, J. S. “Reflections on #Occupy Everywhere: Social Media, Public Space, and Emerging Logics of Aggrega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39, no. 2, 2012, pp. 259–279.

分为信息生产可供性（production affordances）、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和移动可供性（mobile affordances）三个部分。随后，喻国明对这三个部分进行了概念操作化，社交可供性被阐释为“可连接”、“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本文将引入社交可供性概念<sup>①</sup>，分析数字社区公共媒介以何种“媒介逻辑”影响协商治理实践。

### （一）行动者丛：“媒介可连接性”整合治理主体

行动者丛是媒介化“型构”的结构基础，媒介可连接性是利用媒介建立社会网络连接的能力，将分散各地的“离散化”村民重新连接，整合社区治理主体<sup>②</sup>。随着我国城市化、市场化对农村的深入影响，大量青年劳动力外流，村庄公共事务常常“无人问津”，呈现出了一种“无治理主体”格局。数字社区公共媒介则将村两委、外出村民、在地村民等主体重新聚集，形成了全新的“行动者丛”。

#### 1. 村两委成员加入

陶坝村两委全体成员均参与了“为村”平台运营，其中，村支书孔祥华和法务委员郑小琴承担了更为重要的任务。

2013年，孔祥华参加了邛崃市职业化党组织书记选举，当选陶坝村党支部书记。他在“为村”平台写道：“选举那天，面对村民期盼的眼神，我感到了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发誓为他们做点事情，定不负群众期望。”上任后，孔祥华带领村民完成了道路硬化工程，大力发展产业，注重文化建设。2017年，在孔祥华支持下陶坝村“为村”平台位列全国前列。

郑小琴2010年大学毕业后，曾有过短暂的北京打工经历，对“互联网+社区”运营颇有心得。2013年雅安地震后，她非常牵挂距离震中仅20公里的家乡陶坝村，当天即返回了成都。随后，邛崃市恢复重建项目迅速展开。郑小琴决定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她加入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成为陶坝村委会一员。2017年3月，郑小琴担任陶坝村“为村”平台总管理员，负责整体运营工作。

#### 2. 吸引村民加入

陶坝村“为村”平台于2017年3月上线。为了推动村民加入“为村”，陶坝村举办了一场培训会，然而注册人数依然很少。

村两委成员面对推广困境一筹莫展。对此，郑小琴认为：“很多人不愿注册是因为平台上没有他们关心的事，如果策划一个让大家都参与的活动，那就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2017年5月，陶坝村两委决定举办“最好人缘”网络评选活动。

郑小琴回忆说：“这次活动村民们很积极，很多是家庭组团亮相，一下增加了很多人气。”各村民小组都在铆足劲拉票。由于投票必须在平台进行，村民就只能注册

① 喻国明、赵睿：《媒体可供性视角下“四全媒体”产业格局与增长空间》，《学术界》2019年第7期。

② 喻国明、赵睿：《媒体可供性视角下“四全媒体”产业格局与增长空间》，《学术界》2019年第7期。

“为村”。村民组长李恒明说：“以前我们进门入户推广时，大家爱搭不理，现在很多村民到我家问怎么注册。”活动开展10天左右，注册人数增加了600多人，很多是外出务工人员。随着人数增多，一个由村两委成员、在地村民以及外出村民共同组成的“行动者丛”形成，为基于数字社区公共媒介的治理奠定了基础。

## （二）指引框架：“媒介可致意性”促进公共交流

指引框架指型构的行动“主题”，对本案例而言即陶坝村引入“为村”的“目标导向”。指引框架可分为“交流”和“共识”两个层面，交流是基础，共识是目标，相辅相成。媒介可致意性指媒介促进交流、建立联系、表达心意的特性，是促进公共交流的重要因素<sup>①</sup>。对于乡村而言，数字社区公共媒介可以将很多无法使用口语表达的话题公开化以促进公共交流。

2017年，陶坝村为了引导村民集中讨论一些重要话题，先后上线了“陶坝村的祖辈们”、“陶坝青年归去来”、“陶坝环境靠大家”、“我给村干部点个赞”等专题。

### 1. “陶坝村的祖辈们”

陶坝村像中国多数西部农村一样面临“空心化”问题，因此，“陶坝村的祖辈们”成为了最早开设的专题。专题主理人杨开涛是村民公认的孝子，1990年代末他背母30公里看病的事迹广为流传，他还是2017年陶坝村“最好人缘”获得者。

杨开涛在专题首页写道：“流金岁月，珍贵时光，跟我一起记录陶坝村祖辈们的点滴，分享给在外工作的儿孙们。”页面显示165人参与，3.1万次浏览，其中杨开涛发了100多条帖子。这些帖子既有对孝道文化的宣传和理解，也有村两委关爱老人的工作记录，还有老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杨开涛说：“这样做一是让老人们感到有人在重视他们，另外希望在外打工的人安心。”因此，这个专题就成为了凝聚外出务工村民的平台。孔祥华说：“很多外出年轻人关注‘为村’就是因为在上面可以看到自己的父母，‘为村’像一根风筝线，连接着村内村外。”

### 2. “陶坝青年归去来”

这个专题由郑小琴发起。专题首页写道：“4·20芦山地震，我们返乡了！这些年我们为村庄思考了什么，带来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让我们一起记录。”

郑小琴说：“邛崃市有很多像我这样回来建设家乡的青年，我希望把这些人凝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建设家乡。”如今这个专题聚集了很多归乡青年。

姚希在邛崃市大同镇党政办工作，她说：“毕业后在外漂泊，总感觉有一股力量拉扯着，最终回到家乡。看着家乡的变化，觉得自己有一份力在里面，倍感自豪。”

邛崃市大同镇周沟村驻村干部张莉贤发帖说道：“那场地震后，返乡年轻人再没有离开满目疮痍的家乡。十一年过去了，家乡的生态养殖基地、猕猴桃基地、佛手瓜基

<sup>①</sup> 喻国明、赵睿：《媒体可供性视角下“四全媒体”产业格局与增长空间》，《学术界》2019年第7期。



地都发展起来了……此时的陶坝村生机勃勃！青年是创造者，是家乡建设的生力军。”

如今，这个专题已经成为返乡青年的公共交流场域。青年们诉说着家乡情结，探讨着家乡变化，规划着乡村发展，为了家乡惺惺相惜。

### 3. “陶坝环境靠大家”

环境卫生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陶坝村在平台开设了“陶坝环境靠大家”专题，赞扬环保行为、鞭挞破坏行径、倡导环保理念。

环卫工人李树琼是该专题主理人。李树琼说：“我每天都发帖，哪里脏了、坏了，全村人都能看得到。”李树琼的“打卡”也成为了“为村”的一道风景线。由于她只有小学文化，因此发帖文字较少，比如“把河坝清理干净”、“把环境卫生搞漂亮群众说巴适”，但这些帖子却影响着村民的环保意识。一位名叫张莉的村民说：“以前陶坝村环境很糟糕，地无三尺平，满路是泥泞。孔书记上任后就开始修路抓卫生。有了‘为村’后，陶坝村环境又有了提升。我们经常看到李树琼在平台发布打扫卫生的照片，也就不舍得再去破坏环境。”

孔书记也经常在该专题发帖，在他带领下村民们开始积极发帖。环保议题牵涉范围广泛，这个专题参与人数也众多，这对促进公众参与村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为村”激发了普通村民表达的欲望，促成了福柯所言的“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sup>①</sup>。数字社区公共媒介的“可致意性”加强了村民的公共性话语权力<sup>②</sup>。

#### （三）指引框架：“媒介可传情性”建构社区共识

媒介化“型构”的指引框架最终要落实为社区的目标导向，需要行动主体开展动员，而媒介可传情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介可传情性是指用户通过媒介示情的能力，用以评估媒介是否为酝酿情绪感染、推进情感共鸣提供了合适的渠道<sup>③</sup>。我国农民对于情感的表达比较含蓄，但数字社区公共媒介提供了表达浓烈情感的途径。“情感”是公共领域中铸就集体意识的驱动力，这对于建构社区共识具有重要意义。

孔祥华说：“只有让每个村民敢说话，有话说，才能发挥‘为村’的力量。”但是动员大家参与不仅要晓之以理，更要动之以情。郑小琴说：“如果我每天只在平台说，请大家为了村庄荣誉一起发帖，肯定没人理我。所以我就经常发一些煽情的帖子，唤起大家对家乡的情感，才能让大家更好参与平台。”下面选取一条帖子：

“为村”是陶坝村对内治理的平台和对外宣传的名片。做好“为村”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如今，陶坝“为村”已经成为全村的精神家园。给远在他乡的游子带来家的温暖，给村里的人们带来心灵安慰，这就是做“为村”的使命感。建设数字乡村需要有你有我，需要您的发帖、评论和点赞。哪怕是一张照片，

① 潘祥辉：《“无名者”的出场：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6期。

② 匡文波、邓颖：《媒介可供性：社交平台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③ 喻国明、赵睿：《媒体可供性视角下“四全媒体”产业格局与增长空间》，《学术界》2019年第7期。

一句话都是在助力村庄发展。“人人为村，村为人人”。

这条帖子获得了很多村民的点赞和评论：

郭立明：白天在城市忙碌，晚上定会打开“为村”，因为那里有父老乡亲。

李忠强：“为村”是一张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

梁秀华：齐心协力，再创辉煌，人人为村，村为人人！

随着村两委和村民基于“为村”平台展开的互动，“人人为村”理念逐渐成为了陶坝村数字治理实践的重要指引框架。

#### （四）交往实践：“媒介可协调性”促进协商行动

媒介化研究中，交往实践是指众多行动者的互动过程。根据协商治理实践，数字媒介的可协调性在促进众多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介可协调性指在信息网络中，通过媒介协调调动多个组件促成信息网络协同运行的能力<sup>①</sup>。数字社区公共媒介的功能板块设计配以行动者的创造性使用，有效促进了协商治理。

##### 1. 自下而上：“书记信箱”加强干群交流

书记信箱是“为村”平台中村民与村支书直接对话的渠道。村民把“急愁难盼”的问题写出来，不仅书记可直接看到，全国网民都可看到。调研中，村支书对书记信箱反馈最多的是“必须尽快回复和解决，不然无数双眼睛盯着”。

赵齐春是陶坝村第一个通过“为村”书记信箱反映问题的人。郑小琴说：“他以前真的是一个‘刁民’，因为‘为村’，整个人都变了。”赵齐春以前经常上访，举报村两委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上级调查发现举报与事实不符，所以上访一直没有结果。某日凌晨，郑小琴接到了赵齐春电话，说路坏了。郑小琴回复道，那我们派人去修。然而因村委会忙于其他事务，修路被耽搁了。郑小琴回忆说：“一天晚上，赵齐春又打来电话，他说如果不修路，佛手瓜就运不出去。我说你把电话挂了，我给你微信发个链接，你把想说的话全都写出来，成都市领导会下来解决。很快，赵齐春就在书记信箱发了第一封群众来信。”

第二天，孔书记回复道：来信已收到，一个星期内会修好路，保证村民把农产品运出去。随后赵齐春又回了一句：书记，一言为定，不然有你们好看的。郑小琴看到回复后就和孔书记说：“您再回一句‘我说到做到’。很多人会关注这封信，所以您必须及时处理。”一个星期内，路修好了。从此，赵齐春遇到问题就通过书记信箱反映。调研中，赵齐春说：“以前我总觉得村干部整天无所事事，但是自从有了‘为村’我才知道他们真的在干实事。从那时，我对村干部的看法就转变了。”

“媒介可见性”对于促进政民沟通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汤普森（John B. Thompson）认为大众媒介能够把掌握权力的少数人置于多数人的眼前，通过对权

<sup>①</sup> 喻国明、赵睿：《媒体可供性视角下“四全媒体”产业格局与增长空间》，《学术界》2019年第7期。

力反制实现“可见性斗争”<sup>①</sup>。新媒体环境下，“媒介可见性”效应更是被放大。“为村”平台一方面让村民及时知晓公共信息，增加对村两委的理解，弥补了传统治理中“没看到”就等于“没做到”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村民对村两委的监督效力，群众“无数双眼睛盯着”会督促村两委加快落实，这对于解决协商民主中权力不对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 2. 纵横交错：“议事厅”集体商议村务

2018年2月，“为村”平台上线了“议事厅”板块。陶坝村利用“议事厅”商议了长期无法解决的无偿占地扩路问题。

### (1) 陶坝村建议设立“议事厅”

“议事厅”板块的开发和陶坝村一项公共议事有关。陶坝村外出村民较多，孔书记说：“在村里的人不拿事儿，拿事儿的人不在村里，因此很多事情难以推进。”2017年，陶坝村打算拓宽一条路。为了让更多人知晓此事，参会人员扩大到了30人。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向村民通知了会议内容，但没想到反馈的问题很多。

对此，郑小琴向“为村”提议建立线上议事板块。“为村”负责人陈圆圆询问缘由。郑小琴说：“假如3个人商量一件事，决定后再去告诉第4人，如果他不同意，那就推翻了前面3人的决定。如果建立线上议事厅就可以让每个人表达意见。”

4个月后，“议事厅”版块上线。这个版块有以下几个特点：1. 可定点邀请参会人员，排除无关人员；2. 主持人具有禁言权力，可以把控议事进程；3. 语音文字输入随意切换，不会打字的村民也能发言；4. 自带“会议纪要”功能，议事结束后，议事过程可留痕并对外呈现，保障决策公正透明；5. 议事结束后，错过议事或没资格参与议事的村民可以在议事公告下方发表意见，继续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

### (2) 利用“议事厅”商议扩路事宜

2018年12月4日，孔书记在“议事厅”板块发布了议事公告：

我村佛手瓜蔬菜基地的外联道路特别窄，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道路拓宽是很多村民的共同愿望。不过，由于这条路属于村庄内部道路，如果扩路，就只有道路拓宽建设资金，没有土地补偿金。请相关村民就此事进行讨论。

由于占地涉及大家利益，村民收到信息后陆续进入了“议事厅”。郑小琴说：“一开始发言的人比较赞同扩路，毕竟这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议事过程节选如下：

郑小丽：道路拓宽是好事，个别人不能把利益看得太重。

王霞：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发达，山货才能卖个好价钱。

李飞：道路加宽不仅带来经济发展，而且更加安全，修！

随着讨论深入，不同声音开始出现。郑小琴说：“第一次通过‘议事厅’议事也不是特别顺利，有人认为这个平台太公开了。他们直接给我打电话说，你们为什

<sup>①</sup> 姜红、开薪悦：《“可见性”赋权——舆论是如何“可见”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么在‘为村’讨论这事？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我就说你有啥就说啥，不用担心。他说我文化有限，我说可以用语音转换文字。”随后，“议事厅”中有了反对声音。

于海光：修路是好事，但占我们小部分人的地，受益的是大多数人。

周文昌：赞成修路，可是我觉得不公平。

张莉芳：占地不补偿不太合适吧？

赞成修路的村民开始和反对修路的村民讲道理：

刘海红@于海光：道路拓宽，财源广进，眼光放宽些。

余成华：这条路太窄了，容易出交通事故。

胡敬文：我们不能光顾自己，不管他人，修路是百年大计。

杨凯文：好吧。

孙长平：行的。

最后孔书记说：我知道牺牲了你们的利益，但是齐心协力才能共同致富。

此次议事持续了 72 个小时，最终取得了初步成功。郑小琴说：“线下议事有时间限制，但线上议事可以延长时间，会给大家充分的发言机会。”

孔书记回忆说：“最初有 20% 左右的村民不太赞同，但其余 70% 多村民说服了这部分村民，这种工作方式效率挺高。”郑小琴说：“参加这次议事的 100 多人中有 60 多个不在村里，他们是能拿主意的那部分人，因此线上议事厅发挥了关键作用。”

### （3）线下跟进回访

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郑小琴提议做一次线下回访，她说：“村民们在‘议事厅’回复‘可以’、‘好吧’这样的词。我觉得他们有股气没杀出去。”

陶坝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又开了一次会。很多村民说：“怎么又开会？”郑小琴就说：“虽然你在线上同意了，但我们还想当面征求大家意见。”这次，当时那些在平台中发言较少的人打开了话匣子。郑小琴说：“他们把话说出来，心里就平衡了。”

调研中村民说，“议事厅”太直白，很多想法不好表达。以前开会，我们嘻嘻哈哈开个玩笑就能提意见，但是线上不可以。郑小琴说：“线上开会很多人会顾及面子，比如当面可以有技巧地说一些带情绪的话，但是在平台就很难做到！”

很快，陶坝村各村民小组会议结束，继续维持“议事厅”会议决议。郑小琴回忆说：“虽然我们又召集了一次线下会议，但这并不能否认线上‘议事厅’的意义。先用线上会议会更容易达成共识。线下会议会无限放大反对声音，而先用线上会议更容易放大赞同声音。”

### 3. 自上而下：利用平台开展抗疫行动

2020 年春节前夕，新冠疫情暴发，全国各地紧急采取了应对措施。陶坝村疫情防控中，“为村”平台发挥了宣传、动员、沟通作用。

#### （1）利用“为村”平台同村民沟通

2020 年 2 月 3 日，村干部伍剑在走访监测体温时遇到了部分村民的质疑。当晚，



陶坝村委会在平台发布了一篇题为《请理解支持村组干部》的文章。具体如下：

请理解和支持乡镇村组干部，他们没有警服、没有隔离衣，只有一只普通的口罩；他们没有执法证、没有资格证，只有一张村民熟悉的面孔；他们没有请战书，一个通知就得马上到岗；他们告诫大家居家不出门，自己却义无反顾地走访做宣传；他们没想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想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条帖子获得了大量点赞和评论，很多村民留言：

王永芳：这是善良的举措，干部心情焦虑，爱民如爱己，深深感谢！

陶芝阳：我们非常理解，坚决支持！

王良华：关键时刻，社员看干部。

疫情期间，城乡居民和防疫人员发生冲突的事情时有发生。陶坝村两委利用“为村”平台及时和村民沟通，有利于矛盾化解。

### （2）利用“为村”平台征集志愿者

随着疫情加重，很多村庄开始“封村”。很多村民在平台质询为何陶坝村不封村。孔祥华说，我们村居住分散，村口较多，如果封村，村干部人手不够。对此，陶坝村决定征集志愿者，希望村民参与进来。随后，“为村”平台发布了题为《集结号》的帖子：

当前，全国人民团结一心阻击疫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局外人！我们坚挺地站在抗疫前沿，我们不惧艰险，我愿意为你，挡在疫情前，这就是我们——志愿者。陶坝村吹响集结号，征集志愿者加入抗疫一线，共同守护家园。

信息发布5个小时内，就有30位村民报名。如今依然可以看到村民的回复：

孔令军：积极配合打赢无硝烟战争。

何成祥：我来一个行吗？

孔祥华@何成祥：直接报名，我们拉一个志愿者群。

杨开涛：互相转告，积极参与。

江涛：已经满了，报不了了。

孔祥华：还有意愿的下次哈。

郑小琴回忆说：“这次征集志愿者中‘为村’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很多村民说他们就是看到‘为村’集结号来报名的。”

### （3）利用“为村”平台实现“共治”

“为村”平台在“群防群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村民在平台“村友圈”发布信息配合村两委进行疫情防控，还有部分村民在“村务公开”下面以评论的方式参与治理。2020年春节期间，很多村民依然聚会聚餐，甚至聚集打牌。一位名叫李玉祥的村民在一篇题为《听从党召唤，积极控疫情》的通告下面回复：

李玉祥：天天聚众打牌没人管。

郑小琴@李玉祥：大家都是监督人，你可以制止。

李玉祥：今天晚上又聚众打牌了，都没戴口罩。

孔祥华：大家行动起来，坚决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刘太明：共同努力抗击疫情。

孔令军：要听话哈，不然伤的是全国的人。

总之，基于数字社区公共媒介开展的交往实践中“媒介可协调性”具有重要价值。“为村”平台“书记信箱”使村民拥有了制衡村支书的权力。“议事厅”使得留守和外出村民均可参与公共议事，具有协调社区内部和外部的潜力。

本文对陶坝村数字治理实践的追踪就此打住。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媒介化治理“型构”基本形成。数字媒介在催生社会资本、建构社区认同、促进基层合作等方面具有较大潜力<sup>①</sup>，从而构建了一种基于数字媒介的协商治理模式。

#### 四、媒介化协商共治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基于数字社区公共媒介的协商治理中“媒介逻辑”介入“政治逻辑”，从而构建了一种经由媒介化的协商治理实践，本文将其命名为“媒介化协商共治”。媒介化协商共治与强调新兴数字技术主体作用的“数字治理”、“数智治理”等概念不同在于，更加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注重交流、沟通、辩论、协商的价值，强调公众借助数字媒介真正参与治理，从而改变了治理“型构”，只有在此意义上的治理才称之为“共治”。

媒介化理论三要素为理解媒介化协商共治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总体视角。行动者丛层面：数字社区公共媒介将治理相关的多元“行动主体”纳入其中，并形成了媒介化合作网络；指引框架层面：数字社区公共媒介通过“交流”、“共识”两个环节形成了媒介化治理的“行动主题”；交往实践层面：村两委和村民基于数字社区公共媒介通过“共识”和“行动”促进了治理实践。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构了媒介化协商共治机制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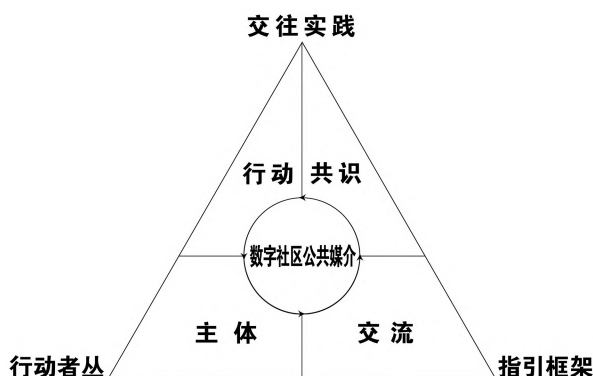


图1 媒介化协商共治机制模型

<sup>①</sup> 许增巍、姚顺波：《社会转型期的乡村公共空间与集体行动——来自河南荥阳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合作参与行为的考察》，《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3期。

数字社区公共媒介实践中“媒介逻辑”从主体、交流、共识、行动四个方面影响了基层协商治理。主体层面：数字社区公共媒介将多元主体纳入到了治理实践中。数字媒介赋予村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得村民成为了可以和基层权力主体“分庭抗礼”的治理主体。交流层面：数字社区公共媒介建构了“共创式传播”模式。基于“陶坝村的祖辈们”等专题，村民之间以及村民同村两委之间良好互动，构建了“交流共同体”。共识层面：村民基于日常交流及专题互动，并且在村两委持续情感动员中，形成了“人人为村”理念，为开展交往实践奠定了基础。行动层面：多元治理主体围绕数字社区公共媒介形成“自上而下”、“纵横交错”、“自下而上”的协商实践。由于数字媒介的“可见性”，村两委必须及时回应“书记信箱”内容。借助数字媒介的“时间延展性”和“空间拓展性”，以往没有机会参与议事的村民也能基于“议事厅”商议无偿扩路事宜。村两委还借助“为村”平台开展媒介化抗疫行动，通过服务、建构和参与的媒介动员机制<sup>①</sup>，吸引更多人力和资源助力抗疫。综上可知，这种媒介化协商实践对于基层公共治理具有重要价值。

那么媒介逻辑具体指什么？本文认为可以分为“内在动力逻辑”和“外在呈现逻辑”。内在动力逻辑指“媒介可供性”，具体包括“媒介可连接性”、“媒介可致意性”、“媒介可传情性”、“媒介可协调性”。外在呈现逻辑指以数字媒介的“时间延展性”和“空间拓展性”为支撑的“媒介可见性”。

首先，“媒介可供性”是媒介化协商共治的内在动力逻辑。喻国明提出“社交可供性”四要素时并没有对其排序，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社区公共媒介“可供性”机制中这四个要素具有先后顺序。媒介可连接性是准入，网络社会中，互联网的“连接”功能将原子式的个体联结起来，赋予个体以信息交互和关系建构的能力<sup>②</sup>。本文案例中只有通过媒介可连接性才能使离散化村民重新凝聚。媒介可致意性是基础，通过媒介的交流、表意，可以使村民加强关联。数字社区公共媒介的可致意性保障了村民享有最大程度的交流权，增强了村民之间的交往动机与欲望。媒介可传情性是升华，相较而言，传播在情感层面引发的认同，比认知层面引起的认同更容易促进一致行动，而且力度更大<sup>③</sup>。村民经过在数字社区公共媒介的情感交流碰撞，才能真正形成社区共识，媒介可协调性是旨归，基于数字社区公共媒介会形成一种互相协调的沟通行动模式，本质是参与式传播过程，公众行动的意识与能力借此得到了解放、培育、集结与持续，从而有助于达成资源动员和社区行动<sup>④</sup>。

其次，“媒介可见性”是媒介化协商共治的外在呈现机制。丹尼尔·戴扬（Daniel

① 郭小安、霍凤：《媒介动员：概念辨析与研究展望》，《新闻大学》2020年第12期。

② 宋建武、张晶晶：《媒介共享：人民性实现的新形态》，《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1期。

③ 赵建国：《论共情传播》，《现代传播》2021年第6期。

④ 陈楚洁：《公民媒体的构建与使用：传播赋权与公民行动——以台湾 PeoPo 公民新闻平台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4期。

Dayan.) 针对新媒体背景下公共空间领域发生的转向提出了“可见性”(visibility)概念。“可见性”探讨个体能否被他人看见,能否获得他人注意力的权力问题。这一概念将媒介话语从单纯提供信息、生产文本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全新的理论维度。在这层维度下,媒介的公共领域不仅仅是社会持续对话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一种提供展现和表演的可见性空间<sup>①</sup>。本文的媒介可见性在此基础上又叠加了媒介的“时间延展性”和“空间拓展性”,从而更加放大了媒介可见性的价值。“时间延展性”指数字媒介能够维持全天候不间断运转,数字社区公共媒介使得公共参与时间“无限延长”,这是村民能够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媒介的“空间拓展性”对于中国当前流动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于“空心化”村庄而言,外出务工村民参与到协商议事之中,保证了协商主体的完整性,促进了政民之间的互信和理解。

本文研究的数字社区公共媒介从设计层面具有较高的可供性水平,能够触发丰富的媒介行动方式。但是,可供性不是技术固有的潜力<sup>②</sup>,而是激活特定群体的潜在能力<sup>③</sup>。因此,我们需要从关系层面去理解媒介可供性,在这个意义上陶坝村村民对媒介的创新性利用同等重要。因此这种媒介逻辑并非是客观自然属性,而是具有关系属性。并非所有社区都可以获得数字社区公共媒介逻辑的加持,只有那些能动性较强的主体才能发挥媒介的最大功效。总体而言,数字媒介为公众提供了数字民主可供性(digital democratic affordance),这种可供性降低了公众政治参与成本<sup>④</sup>,使得公众真正参与到村庄治理之中。当前,处于双重边缘状态的在地村民和流动村民群体规模巨大,却常常被政治领域忽视。数字社区公共媒介的可供性使得个体在公共空间具有了可见性<sup>⑤</sup>。这不仅纾解了村民的“政治参与困境”,而且重构了社区权力结构,有效调整了“协商不对等”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媒介化协商共治模式。

## 五、媒介化协商共治:一场潜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变革

人类始终将民主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本质是希望通过民主达致社会安定有序、经济繁荣发展、个人生活幸福的“善治”状态。因此民主天然蕴含善治诉求,善治必然奠基民主之上<sup>⑥</sup>。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政治形式与治理效能的统一,因此全过程

① Daniel Dayan, “Conquering Visibility, Conferring Visibility: Visibility Seekers and Media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7, no. 1, 2013, pp. 137–153.

② Ann Majchrzak, Samer Faraj, Gerald C. Kane, Bijan Azad, “The Contradictory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Affordances on Online Communal Knowledge Sharing,”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 19, no. 1, 2013, pp. 38–55.

③ 景义新、沈静:《新媒体可供性概念的引入与拓展》,《当代传播》2019年第1期。

④ Deseriis M., “Rethinking the Digital Democratic Affordanc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Toward a New Framework,”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3, no. 8, 2021, pp. 2452–2473.

⑤ 秦朝森、梁淑莹:《多棱角的可见:城市青年流动群体的短视频生产影响研究》,《现代传播》2021年第5期。

⑥ 王晓丽、黄元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过程”逻辑、样态、机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还体现在社会治理层面。不过，学界对于政治维度的分析较为丰富，而对治理向度的讨论还有待深入<sup>①</sup>。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重视选举民主，也重视选举后的治理以及人民的有效政治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多环节民主，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这些环节相互衔接，保证了人民依法行使各项民主权利<sup>②</sup>。其中协商处于核心位置。协商解决的是共识，包括决策前、决策中以及决策后协商。只有经过充分协商的决策在执行过程中才会得到最广泛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sup>③</sup>。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使人民深度参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习近平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sup>④</sup> 基层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既是落实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最重要的政治空间，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基所在。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构建治理形态的民主，而且作为手段的治理形态的民主越广泛、越管用，国家政权形态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目的就越真实、越有效。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致力于建设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最完整的“过程”民主和最“全面”的治理民主<sup>⑤</sup>。然而，当非正式领域发育尚不成熟之时，如何有效制衡韦伯（Max Weber）意义上庞大而理性的现代官僚机构，仍旧是缺乏民主基础的社会中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民主建设而言，当前仍欠缺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案<sup>⑥</sup>。因此当前我国基层民主实践中的“协商不对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

本文提出的“媒介化协商共治”具有弥补基层治理主体“协商不对等”的潜力。“媒介化协商共治”是“媒介逻辑”介入“政治逻辑”，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治理均衡的方式。闫文捷、潘忠党、吴红雨等学者以我国“电视问政”类节目为对象，研究了“媒介逻辑”介入“政治逻辑”的过程和机制，作者认为电视问政是党政力量在媒介领域的扩展和延伸，是政治逻辑启用媒体、令之服务于地方治理改革的实践载体和工具。这与媒介化理论所概括的西方经验中媒介逻辑制约、改造政治或治理逻辑有主次方向的不同<sup>⑦</sup>。不过，本文研究的数字社区公共媒介相较电视媒介更具“独立性”，具有制约和改造治理逻辑的潜力。数字媒介的即时性、可见性、互动性等特性为基层社会营造了公共辩论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全链条”、“全时段”、“全方位”、“全覆盖”的参与途径，弥补了我国基层政治参与制度的不足，保证了公众能够以协商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因此，媒介化协商共治是一种典型的基层全过

① 桂华：《国家资源下乡与基层全过程民主治理——兼论乡村“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5期。

② 肖立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与体系框架》，《人民论坛》2022年第1期。

③ 肖立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与体系框架》，《人民论坛》2022年第1期。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60页。

⑤ 刘小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特质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⑥ [美]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0页。

⑦ 闫文捷、潘忠党、吴红雨：《媒介化治理——电视问政个案的比较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11期。

程人民民主形式，对于增加社会主义民主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认为，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被重新设想为一个双重现象：一方面涉及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牵涉到公民社会的重新建构<sup>①</sup>。而“媒介化协商共治”一方面可以促使公众形成合作网络，另一方面借助“媒介逻辑”改造了基层权力运作模式。库尔德利借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概念，指出媒介实践本身可以能动性地开创某些全新社会空间<sup>②</sup>。媒介化研究旨在关注“哪些特定的社会行动场域因为媒介展开或关闭”，这也为传播学者重思媒介研究的经典命题提供了理论基础<sup>③</sup>。本研究中，如果没有数字媒介，公众就缺少了同基层权力主体博弈的社会空间。数字媒介保障了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将媒介化协商贯穿于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体现在重要决策制定前、制定中、制定后的执行全过程之中。媒介化协商共治通过广开言路、交流协商、集思广益的方式让公众参与基层治理，形成了一种包括“理念、渠道、氛围、实践”的协商民主形式，对于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媒介化协商共治只是一种发展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形式，依然存在很多不足。比如，数字社区公共媒介的“媒介可见性”可以促进村两委和村民之间的互信，但是有时也会抑制公开言论表达。这可能和人们对线上、线下不同表达方式背后的风险感知心理有关。因此，媒介化协商治理还需在协商流程以及媒介呈现形式上精心设计。不过，民主实现不仅需要技术的革新，更需要民主开放的领导者以及具备议事能力的公众，以上要素的完善还需要基层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最后，还需要强调本文选取案例遵照“典型性”原则，即选取了能够发挥最优治理绩效的案例，但事实上还有很多不太成功或者失败的案例，这些案例同样值得进行比较研究或者行动研究。不过，像陶坝村这样的案例虽然只是星星之火，但是却为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照亮了光明之路，推进“中国式民主”向前发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数字社区媒介与乡村公共文化传播模式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0YJC860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

① [美] 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

② 戴宇辰：《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一个批判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

③ 戴宇辰：《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一个批判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